日治時期臺灣勞工運動的社會經濟學分析

陳柏安 Bo-An Chen

June, 2023

二十世紀全球工業社會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相關研究中，勞工運動一直都是代表集體主義的反動角色。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勞工運動常被論述爲民族主義解放運動的附庸手段，其經濟自主性在這些帶有特定政治或歷史意義的論述中常被化約爲無。有鑑於此，本研究從經濟研究角度切入，試圖一窺臺灣日治時期勞工運動的經濟性動機。同時，本文亦透過個體理論的觀點強調勞工運動中機會平等主義的影子，再從社會網絡角度討論工會對於勞工運動的意義。最後，我們回歸到臺灣日治時期的社會脈絡，期待從平等主義的角度深入反思勞工運動作爲集體行動的意義與影響。

1 殖民臺灣被忽視的勞工運動自主性

二十世紀爲全球性工業社會變革的歷史轉戾點，不僅生產技術的提升加速了全球工業化的速度，以歐洲爲中心的帝國殖民主義亦強化了工業對個人能動性的異化 (alienation)。在個人受到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雙重壓迫的情況下，集體行動 (collective behavior) 成了因應此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手段。勞工在生產技術外生衝擊的最前緣，他們透過工會主義 (unionism) 挑戰當時的或與殖民政府共謀的資本制度。在歷史研究中，許多學者關注了非洲、南亞、乃至於日本的罷工特性及其動態 (Barchiesi, 2007; Wolcott, 2008; Gordon, 1997)，但鮮少有研究關注亞洲在地緣及殖民關係交錯下勞工運動的發展。在此背景下，臺灣於日治時期的勞工運動研究將可以提供另一個脈絡釐清集體主義的發展。

在殖民背景下，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與自決權更使工人爲對抗資本主義的集體意識高漲。因此，一直到二戰結束乃至全球性的解殖運動前，勞工運動與民族主義始終難以被獨立地討論，更甚者，爭取勞工權利的運動往往被視爲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組成運動。在臺灣日治時期的組織運動討論中，工會運動亦時常被視爲民族主義鬥爭的附屬品，而非具有自主性的運動 (Ahlquist, 2017)。由於 1927 年開始活躍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工友總聯盟、臺灣農民組合的主要幹部，如蔣渭水 (1888-1931)、蔡培火（1889-1983）、連溫卿（1894-1957) 等人皆有緊密的聯繫，因此即便有工會獨立的發展勞工運動，也會在後續與大型團體的合作下，使其自主性在歷史論述中被沖淡。再者，在國民政府戒嚴及二二八事件影響的衝擊下，當時的左翼及勞工運動也在歷史論述中被化約爲追求中華民族主義的抗日活動 (公論報, 1950)。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觀點下，勞工本身便有足夠的動機組織勞工運動，而不必仰賴民族主義的動能 (何明修, 2015)。馬克思主義主張勞工應追求一個生產工具共有的社會，即生產者在進行資本的投資時，這些資本不應全然作爲股利，而需重新分配回報勞工 (Morishima, 1973)。這樣的論述基於與當今主流基於效率經濟的新古典主義大相徑庭，但這樣的分配制度確實可以提供勞工足夠的動機追求社會制度的變革。實際上，1927 年除了臺灣文協的文化運動倡議外，更有了臺灣第一次的全島總罷工。罷工主要的訴求無非是要求資方保障勞動權益，不得不經預告解僱勞工、要求同工同酬、及合理的勞動時間及福利保障 (蔣闊宇, 2020) 。

民族主義與勞工運動的交互作用雖然提供了巨觀的集體行動動機，但在帶有壓迫性的殖民社會中，集體行動的早期形成階段必然面對巨大的風險。面對社會環境的壓迫，勞工們爲什麼甘願各自冒著風險參與聯合的集體行動，則鮮少有深刻的經濟學分析。除了透過總體經濟學的分析來了解生產份額分配與勞動的交互關係，我們或可以從個體經濟學理論及社會網絡的分析來釐清工會運動成功的要素。其中，最關鍵的框架爲談判理論 (bargaining theory)。透過釐清工人結盟前與結盟後對與資方談判的結果，我們可以在理性決策的假設下預期不同社會角色的選擇動機 (Katz, 1993)。這並不代表經濟學僅能透過邊際效用、最佳化等被視爲「效用主義」產物的視角來闡釋工人在社會文化、結構下面對的選擇條件；相反的，個體經濟學時常利用顯示性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僅根據工人選擇的結果進行經濟學推論。工人們或透過集體行動強化談判籌碼，以改善勞動條件、要求提高工資，或實踐內部的公平正義。

爲了從臺灣的殖民經驗及勞工運動重新認識東亞的政治地理學，我們嘗試透過歷史學資

料重構日治時期臺灣工會運動的社會經濟學樣貌，包含總體經濟對運動環境的影響，及勞工個體參與運動的動機及偏好。隨著蔣闊宇 (2020) 出版目前最完整的日治時期工運史料整理書籍,《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我們得以縱覽大多日治時期所有可追溯的工運細節並有完整的資料目錄。除了《全島總罷工》外，本文亦參考日治時期由警方紀錄，翁佳音 (1992) 所譯註的《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藉由這兩本書的史料及評論，同時透過臺灣文獻資料庫重新檢視相關引用文獻，包括《臺灣新新日報》、《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本文將討論臺灣日治時期勞工運動對集體意識的重要性[1]。

本文將在第二章介紹臺灣早期工會形成的歷史、社會、及經濟背景，並隨著時序介紹工會運動的演變及全島總罷工的發展。第三章將介紹不同工運組織的互動，及勞工運動的訴求如何從最早追求薪資的成長演變到平等權利的追求，並強調後續勞工運動發展的機會平等主義 (egalitarianism) 內涵。當時的機會平等主義除了在工會運動的意義上，亦提供了個體經濟理論公平配置機制行動者利他偏好的證據。最後，第四章會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綜合分析勞工運動的理性預期，並從社會網絡的角度分析 1928 年後工會運動的再去中心化現象。最後，我會總結當時工會運動作爲集體行動爲臺灣歷史及社會帶來的啓蒙，並以此爲基礎討論後殖民主義與集體行動的深遠影響。

2 1928 以前：工運的蓬勃發展

臺灣於日治時期的工會運動往往被視爲民族主義的副產品。這個觀點不僅是受到國民政府戒嚴及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影響，也是源於臺灣民衆黨、工友總聯盟在 1930 年代運動路線的改變。由於後期臺灣支持勞工運動的政治組織在核心價值上進行鬥爭，因此在運動論述上強調民族的未來及社會結構的改革，而非最初工會運動的自主性 (連溫卿, 1998)。但這樣的論述不僅化約了工會運動從去中心化到組織聯盟的發展動機及歷史途徑，也忽視了經濟個體本身在集體行動的能動性。面對被化約爲民族主義的工會運動論述，若要有符合經濟學觀點的分析，我們必須先重新梳理當時勞工運動如何發展爲工會運動，才能提供個體經濟學的分析。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整理，臺灣的早期工會運動中，最先具有組織性的運動大多由日本內地人發起。目前所知最早的工會，台北大工組合，由日本內地人與少部份臺灣本島人所組成。儘管工會內部有臺灣成員，但二十八名幹部中只有一名幹部爲本島人，剩餘皆是內地人。其中大工組合從 1903 年創立當年即發起團體協商，1907 年發起同工同酬運動，1908 年發起大約兩百七十名工人參與的罷工運動，直至 1909 年都仍可見其活躍痕跡。其餘由日本內地人發起的工會運動組織包含 1918 年成立的台南職工組合，以及 1922 年創立的台北疊職工組合。前者於 1918 年發起提高工資的集體協商，在失敗後即沒有活動資料；後者則爲提高工資而設立，但沒有其他發起具體工會運動的相關資料 (蔣闊宇, 2020)。

相對於工會運動，臺灣歷史上最早具有組織性的政治運動是在 1914 年間日本人板垣退助（1837-1919）來台成立的臺灣同化會。爲順應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同化會旨在於文

[1]根據作者所知，以上資料是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勞工運動少數較完整的著作及資料，故本文將大量引用以上文獻並作交互比較，而少提及其他論述。

化層面上同化臺灣人和日本人，以口號「和日本人權力平等」爲一大誘因，吸引臺灣人加入，因而吸納不少臺灣本土菁英，如林獻堂（1881-1956），也進而使同化會本質有所改變。儘管同化會原先起於日本殖民政策，林獻堂在「權利平等」的「口號」下，在台中開始推動臺灣人的實質平權運動，包含教育活動、本土文化復興，以及反專制等倡議 (王育德, 1999)。除了臺灣同化會的成立，具有工會功能的組織也逐漸有了雛形。1925 年 6 月在二林的蔗農組合成立，同年簡吉（1903-1951）等佃農也成立鳳山農民組合，後者因土地糾紛對陳中和物產公司發起鬥爭，並獲得勝利 (王育德)。至於臺灣本島人目前所知最早創立的工會組織爲 1920 年成立的三個台北印刷工會。1923 年他們發起罷工，主要訴求爲抵抗業主廢除津貼的企圖，並在 1927 年三個組織共同整併爲「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蔣闊宇)。值得注意的是，在 1927 年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成立時，全臺各地都已有工會的成立，且全島總罷工已發生。換言之，在 1923 年台北印刷工會罷工以後，臺灣又陸續發展出了草根工會，惟其他政治組織如臺灣文協還未發展出其影響力。

我們或許難以說臺灣工會組織的發跡先於或後於政治運動組織，但兩者有各自的演進方式。前者的早期發展仰賴日本人對於勞動權益的追求，並透過共同參與日本人所組織的運動學習工運的目的及手段。後者則是基於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在平權運動中，爲了尋求更大的社會動能而發展出的組織。然而，從早期的組合名稱可見，文協、農工組合、工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 1926 年開始更爲緊密，1927 年以高雄機械工會爲開端的全島總罷工更是凸顯了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

1927 年中旬，高雄機械工代表進行磋商，希望成立高雄機械工會。在草創初期，會員服務臺灣鐵工所得佔一百名、服務於淺野洋灰會社的佔三百多名，服務其他小型鐵工所得則有一百多名。由於工會的組成造成了資方的壓力，資方各自採取了不同的對策。淺野洋灰會社對工人進行了「安撫」，在工會發會式，給相關幹部各包了 10 圓紅包進行祝賀，同時將當天視爲會社成立十週年紀念，爲全體員工加薪。(臺灣民報)[2]。

相對的，臺灣鐵工所則採取了與工會敵對的手段。在高雄機械工會成立之前，臺灣鐵工所內部已有三個職工團體，分別是職工友誼會、社員友誼會、運動部。其中前兩個限制日本人參加，而爲了紓解臺灣人對於民族差別對待的不滿，才成立運動部允許臺灣人參加。在工會成立的消息傳播之時，資方認爲臺灣人加入工會的動機仍是民族差異 (蔣闊宇)，因此試圖成立「融合會」。然而，根據臺灣民報的報導，職工表示他們曾試圖加入友誼會並繳納過會費，但不能參加活動；如今他們試圖成立工會，他們薪資微薄無法同時支付工會（高雄機械工會）及融合會的費用[3]。可見當時融合會需要繳納會費，而工人對於繳納的會費回報感到不滿。

爲了應對融合會的成立，高雄機械工會初期成立的幹部，同時是鐵工所第二廠工人代表的王風代表出席會議。王風於會議表示此決議需與其他工人討論，但鐵工所主任要求他須於現場作出決定。在雙方沒有共識下，王風要求第二次會議，主任則現場宣佈融合會成立。而在高雄機械工會發會式前，警察拜訪了受到邀請的人員。在當天，六百多名會員僅有三百多名會員參與，且全程受到警方監控，發言亦受到警方干涉[4]。發會式隔日，透過工會決

[2]《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二號、《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五號。本文未註記旁引之引用註脚表示作者有再次透過資料庫檢視資料的正確性，惟其敘述內容可能與蔣闊宇 (2020) 部分相似。

[3]同上註

[4]同上註

議，勞工方正式回絕加入融合會的要求，而會社立即以事業不振（警方說法）爲由解僱王風(翁佳音, 1992)[5]。王風被解僱的當天，高雄機械工會召集會員，做出要求資方爲王風復職的決議，否則則發動罷工。工會做了正式向資方詢問解僱王風的理由，亦要求往後解僱員工時必須事先告知，但被資方敷衍及拒絕[6]。高雄鐵工所於 1927 年 4 月 7 日發起罷工，以此爲全島總罷工的導火線，各地陸續有罷工發生。

事件核心的臺灣鐵工所工人中共有 160 名台籍工人，其中有 120 多名參與罷工行動。在罷工運動期間，高雄機械工會曾向臺灣文化協會請求援助，因此農民組合與文協的代表都曾協助高雄機械工會工人與資方進行談判。罷工發生後，臺灣鐵工所解僱全部參與罷工行動的工人。然而，其他友誼團體繼續透過活動倡議募集物資，也舉辦演講爲工人宣傳。其中，台南機械公會募集了兩百餘元提供高雄機械工會作爲其罷工基金；東港及潮州的農民組合則寄去白米二十袋、蕃薯百袋作爲物資應援；台北機械工會則要求其會員不得因應資方要求而至高雄支援鐵工所的生產活動[7]。

臺灣鐵工所拒絕高雄機械工會的訴求包含取消王風的解職、解職員工需提前兩個月預告、對解職職工需支付二十至三十日薪水等。相對的，爲了表示對高雄機械工會的支持，全島各地共計六十多間工廠，總共四千多人參與響應行動。然而，罷工運動亦遭到各地警察壓制。如《臺灣民報》所報導，新竹文化協會支部在舉行「同情高雄機械工友」罷工演講時，有多名便衣警察混入會場，在主講者進行:「同情高雄 ……」語未畢時即下令解散，且一路追緝演講者至媽祖廟。臺南文化協會支部亦被嚴格控管，任何聚會，乃至於與農民談天也會被解散，簡吉即在農村談論農事被拘捕[8]。但即便殖民政府透過公權力對勞工運動的發展進行壓抑，各地的工會仍陸續加入全島總罷工的行列，在工運浪潮下，爲了鞏固結社自由與強化平等主義的論述，蔣渭水等人另外成立了臺灣民衆黨，連溫卿所主導的臺灣工友總聯盟也跟著成立[9]。前者在後期運動代表著左翼思想，後者則被視爲右翼勞工組織。但不論核心思想，兩者都在全島總罷工扮演了了倡議及串連不同工會的角色。根據工廠名簿所統計，當時參與罷工的人數佔臺灣本島全部工人的 7.4% (蔣闊宇)。

高雄鐵工所的罷工在爭議末期,「有力者」進行勸說進行調停。這些有力者，如陳光燦、林伽等人，表示應將訴求聚焦於王風的復職上，而放棄全面的抗爭。然而，對於工會而言，此罷工雖因王風而起，但在當下已發展成全勞工訴求勞動條件改善的共識，不會接受此提案。在調停失敗後，警方正式介入罷工爭議，要求高雄機械工會不得接受連溫卿、黃石順等人在協商的協助，並令其工會會員不得干涉未入會的職工的工作意向[10]；同時，警察透過公權力宣布職工未結清的工資在發放期限前不領受者，直接交付公共保管機關並直接解除勞雇關係[11]。警察的策略在於孤立高雄機械工會與其他友會的聯繫，並透過「自由」的論述規範工會的影響力。在警察提出條件後，罷工者面對失業風險，陸續有職工復職。在這之後，爲了加速罷工的崩解，警察開始逮捕工會成員及幹部。1927 年 5 月 25 日高雄鐵工所

[5]旁引自蔣闊宇 (2020)，頁 77。因翁佳音 (1992) 所譯註的《臺灣社會運動史》爲日治時期所由警方所做成的紀錄，故蔣闊宇強調其爲警方說法。

[6]同上註

[7]同上註

[8]《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六號、《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七號

[9]《臺灣民報》第一百六十六號、《臺灣民報》第一百八十八號

[10]《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六號

[11]《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7 年 5 月 8 日，〈對解雇職工最後通牒〉

幹部蘇龍允、郭清被逮捕並分別被判處懲役四個月、罰金 30 圓及處懲役六個月、罰金 30 圓。在這之後高雄鐵工所的罷工事件逐漸平息，而全島總罷工雖然陸續維持到了 1927 年的下半年，但也在殖民政府的壓迫下被解散。

從最早臺灣草根工會的形成至全島總罷工的事件始末分析，雖然我們可見臺灣文協在串連不同運動動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罷工的事件及工會的成立仍可清楚的見到工人們本身的動機及自主行動。事實上，在高雄鐵工所的罷工事件中，高雄機械工會最早不必仰賴臺灣文協，甚至是農工組合，便可以自主維繫工人發起罷工。另外，從最早日本人主導的罷工，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種族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對立關係以外，臺灣與日本勞工也有一定的共同意識。由日本內地所帶進的工運思潮，在經由臺灣內部吸收後，又轉化爲臺灣草根的工會發展動力。除了設立由臺灣人主導的工會具有與資方談判的自主性，更在運動上與日本內地的工會也有意識形態及地緣上的互動。而這樣的自主草根工會運動與過往的去中心化運動相比，又有了更多的「兄弟情誼」。即便如此，這樣的論述仍與民族主義的論述有一段距離，甚至衝突 (何明修, 2008)。基於此歷史發展的背景，我們將在下一章分析勞工的自主性如何發展爲去中心化的罷工，甚至是有組織性的工會運動，並強調其平等內涵的重要性。

3 工運聯盟的形成與平等內涵

回顧日治時期開始到 1930 年的罷工事件，以 1927 年爲分界，在 1898 年到 1926 年的罷工是相對去中心化的，且訴求多聚焦於提高工資；而在 1927 年後由於臺灣文協、臺灣民衆黨、工友總聯盟的成立，工會能夠進行更有組織性且規模更大的罷工，並且有更多元的訴求。我們或可以追問爲什麼勞工會從去中心化的運動策略演進到工會運動，並討論在勞工個體在面對去中心化的運動及工會罷工時的談判均衡。

根據表1，我們可以發現由工會發起的罷工事件其實只佔了所有罷工紀錄中 74 件中的 5 件，且在可以追查工會性質的 3 件中，罷工都是由日本人工會或日本人主導的罷工[12]。由於罷工人數的紀錄也包括了工會組織、人力車罷工[13]，故我們以中位數代表當時罷工的整體規模。

總罷工紀錄次數	成功件數	失敗件數	結果未知	罷工人數中位數	工會發起件數
74	24	23	27	60	5

表 1: 1926 年以前罷工紀錄統計。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我們可以在表1注意到雖然早期罷工鮮少有工會的介入，但罷工人數的中位數仍有 60

[12]《全島總罷工》頁 60 統計 1898 年至 1926 年《臺灣日日新報》所記載的罷工事件共有 76 件、47 件爲爭取薪資、16 件與勞動權利相關 (蔣闊宇, 2020)。然而本文的統計方式扣除了短期內的再罷工，故總罷工紀錄次數僅計算 74 次罷工。

[13]人力車職工共發起了三次罷工，且人數高達 700 人。然而，人力車罷工是針對日治政府對產業的整體規範，其發生意義與勞動者在面對最適勞動供給、實質工資時做出的理性選擇有一定差異。若說我們前面提到的勞動是面對市場需求面或生產力改變的外生衝擊，則人力車罷工面對的是政策外生衝擊。其參與人數代表的經濟意義與其他勞工運動有所差異。

人。以當時工廠的規模，如 1915 年臺灣煉瓦工場的 50 名工人罷工、1919 年新竹製腦會社的 50 名苦力罷工等，幾乎是全廠的員工在沒有工會組織的條件發起罷工。從Myerson (1991) 在存在談判爭議下，社會網絡內部聯盟[14]的形成理論分析，我們或可以推論當時所有的勞工對罷工風險的預期皆小於意圖追求的薪資漲幅。換句話說，因爲沒有中心化的組織使所有工人享有完全的資訊，僅能依靠工人既有的網絡連結進行溝通，因此工人除了相信集體行動帶來的利益外，無法透過全然地了解聯盟內其他工人的最適回應，只能做出同時性決策 (simultaneous move)。先前的研究者雖未直接使用同時性決策的賽局理論，但他們在相似的政治社會學框架下解釋了二十世紀初期辛巴威的罷工行動。然而，當時辛巴威的罷工雖然也是爲了爭取薪資增加，但勞工卻處於殖民奴役的狀態，而且薪資明顯無法滿足生活所需 (Makambe, 1994)。辛巴威的案例不僅指出了罷工者共同承受壓迫的經驗，同時也隱含了在極端困境下不得不發起罷工的條件。若要驗證臺灣早期罷工是否也適用社會網絡下同時性決策的分析框架，則我們必須強調工人既有的社會網絡是罷工發起的「社會空間」邊界且網絡度數 (degree) 呈現均勻的分佈，同時沒有勞工會預期在罷工中獲得較高的回報[15]。

由於早期的罷工幾乎是全廠同時發起罷工，且多是單一產業單一工廠所進行的，因此工廠內部的人際網絡幾乎是罷工可以觸及的封閉網絡邊界，故第一個假設是個合理的推測。至於是否會有勞工預期在罷工中獲得較高的回報，從實質工資率的成長來看，罷工所帶來的效益是均勻的，甚至可能出現「搭便車 (free rider)」的現象。然而，在個體經濟理論中，我們不應強調實質工資率的回報，而應分析個體的綜合偏好。我們假設除了實質的工資成長，勞工亦會透過發起罷工改變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階序，意即他們未來將會在工作社群中有更大的影響力。但在我們所收集的早期工會運動資料中，不論是日本人所組織的工會或臺灣草根發起的罷工，除了大工組合外，後續都沒有相關產業勞工活動的紀錄。雖然工人本身的異質性難以從既有文獻觀察，但在有限的資料下，我們或許可以同意社會網絡中的同時性決策賽局可以一定程度的描述臺灣早期的勞工運動。從同時性決策賽局出發的分析去中心化的罷工，我們不僅能得知勞工在面對罷工選擇時具有相似的風險及預期回報評估，也可以推論在罷工成功後，他們所得到的回報也是均勻的。這個結果在可轉移效用賽局 (Transferable Utility Game, TU Game) 的分配問題中被視爲是一種「公平」[16]的配置機制，且是權利平等 (rights egalitarian) 的分配 (Myerson, 1980)。

然而，正如集體談判理論大多指出罷工雖有助於提升勞工與資方談判的籌碼，但仍仰賴工會的組織性有較高的發生可能性 (Bronars and Deere, 1991)。去中心化的集體罷工除了增強集體協商的談判籌碼外，對於個人的預期回報並沒有影響，且衆人必須要有對資方共同的不滿並都有承擔罷工風險的想法才有辦法組織勞工運動。相對於去中心化的性罷工的高門檻，若有具有延續性的工會，不僅發起人可以從成功的罷工事件獲得較高的回報，也

[14]本文的「聯盟」專指談判理論及合作賽局中的 coalition，指的經由不同機制所形成的合作團體。在本文的脈絡下，聯盟指的是共同發起罷工的工人組織或團體。

[15]要套用社會網絡下的同時性決策賽局之所以要求這兩個條件，其一是如果存在一個中心化的聯盟，則聯盟便可以將資訊分享給所有參與者，此時，參與者便可以考慮集體行動外各自在聯盟中的最適角色並進行決策的調整；其二是如果存在一個罷工者預期罷工獲得的效益較高，則他有較高的動機去改變其他人的行動，進而改變聯盟的網絡結構。

[16]此處的公平指的是如果透過不同機制所形成的聯盟最終相同，則所有運動的參與者的預期回報與形成機制無關

可以提高社會網絡內部溝通的效率，持續的整合勞工意見進行集體協商，增加聯盟內部的溝通效率以提高整體的談判效率 (Rubinstein, 2001)。這樣的聯盟形成機制與去中心化的罷工的形成機制有明顯的不同。首先，由於罷工的中心組織需先有部分罷工人發起，因此聯盟的形成早期爲一動態的協商過程。這個時候，邀請其他人參加罷工者會考慮到被邀請者對聯盟的邊際效應及邀請成本，被邀請的人則會思考參加罷工的風險，及他加入罷工所增加的邊際效應 (Hsieh et al., 2023)。

由於Hsieh et al. (2023) 的文章研究的對象是阿拉伯之春的抗爭動員，因此他們預設中心聯盟已經形塑完成了，所以僅考慮到被邀請者面對的選擇效用。但在 1927 年臺灣的罷工運動是由少部分工人先組成工會組織後，再邀請其他工人，最後基於形塑完成的聯盟與其他政治組織共同合作，故我們也考慮一開始組織內部罷工之間互相串聯的邀請過程。這個邀請過程可以被視爲一系列的雙邊談判 (bilateral bargaining)，其目的在於透過談判的過程達到雙方都滿意且穩定的結果。這樣的談判均衡又被稱爲成偶穩定性 (pairwise stability)，在次可加性賽局 (superadditive game) 及公平配置機制下，會促成大聯合 (grand coalition) 的形成 (Jackson, 2003) [17]。在完全資訊且有效率的 (efficient)[18]條件下，以上的賽局會得到工會永遠可以形成大聯盟的結論，這與我們實際上觀察到的不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邀請方及被邀請方的邊際效用都必須付出成本。邀請方付出的是溝通成本、被邀請方付出的是行動風險，這兩個成本在殖民統治的社會環境下特別明顯。畢竟，如高雄機械工會在罷工時期時，試圖邀請其他工人加入工會可能會形成「脅迫罪」[19]，而工會成員或其他工人在選擇加入罷工時，可能面臨被解僱的風險。這些社會條件使得這個合作賽局不是有效率的。在賽局不是有效率的情況下，原本的理論推論會得出即便是邀請方都可能沒有動機擴大聯盟的結論。這個推論又過於極端地不符合現實。

一個值得提及的宣言是在 1927 年全島總罷工，高雄機械工會仍在抗爭的過程中，新竹木工工友會發表在《臺灣民報》上的宣示。其表示「在文化燦然的現代的共同生活之中，我們倘須徬徨於貧窮線下、做那「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生活。尤其是一旦發生疾病、就要陷於淒慘的苦境」，並且提出「團結」是勞動者唯一面對生存壓力唯一的目標[20]。乍看之下這是在全島總罷工浪潮下，順勢而成立的工會，並非前述有組織性的工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竹木工工友會透過《臺灣民報》宣傳的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中心化訊息傳播路徑；同時，他們不斷強調「團結」及其宗旨在於觸及越多願意加入的工友。稍嫌市儈的說，增加一兩個底層勞動者對於工會的邊際效應應該不如將溝通動能聚焦在與文協等政治組織溝通有效益。但事實上，工會的目的不完全是爲了爭取最大的勞動權益，其成立目的同時也與面對社會不平等相關。Flavin (2018) 即指出，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政治組織，工會組織通常具有較高的平等主義內涵。以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綱領爲例，其主張包括限制童工年齡、制定最低工資、救濟失業者等關乎社會平等的宗旨翁佳音 (1992)。若僅以原本的邊際

[17]以上賽局的定義在數學上過於形式化，簡要的說，成偶穩定性 (pairwise stability) 保證的是完成協商的雙方都不再有動機改變談判後的結果；次可加性賽局 (superadditivity) 指的是任何合作都會爲雙方帶來額外的效益；大聯合 (grand coalition) 則指的是在給定的社會網絡下，最終每個社會網絡的行動者都會加入聯盟，即加入集體行動。

[18]在經濟學脈絡下談論的效率通常指的是柏拉圖效率 (Pareto efficiency)，即所有資源都被分配完全且沒有人可以在不降低他人效益的情況下增加自己的效益。

[19]《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7 年 5 月 8 日，〈工友會員爲脅迫罪解送法院〉

[20]《臺灣民報》第一百五十七號

效用分析，則隱含了共榮社會可以分配給每個參與者的邊際效用大於僅由「有能者」極大化效益，這點又與階級不平等的現實矛盾。

這個看似偏好的矛盾，其實可以從邀請其他勞工的邊際成本的另一面，即不邀請勞工的邊際機會成本的角度分析解決。在社會網絡中，一個常被提及的現象是同儕影響。在社會網絡的行爲分析中，一個決策者的效用不僅是自己內生的效用，同時也會受到周遭的同儕，即社會環境影響 (Bramoulle et al., 2009)。當一個社會多數人都保持冷漠的時候，一個人對反動的風險評估也會提高，對於工會成員邀請其他勞工加入罷工的溝通成本也會增加。此種機會成本我們稱之爲建立網絡連結的外部性 (externality)[21]，簡化地說，是工會組織發起者面對沉默群衆的社會環境需要付出的代價 (De Clippel and Serrano, 2008)。這個考慮外部性的策略，或可以從工會組織預期其他勞工的從衆的社會心理學所採取的策略 (Venema et al., 2020)，或可以從工會組織的利他行爲來分析 (Fiorito, 1992; Ramos Parreño and Sánchez-Losada, 2002)。

不論工會是帶有些許計謀性的應對社會的冷漠，亦或是出於利他精神，連結外部性的理論框架都指向工會應該以不斷增加成員並持續進行社會溝通。這樣的結果正符合機會平等主義哲學的內涵。這篇計畫除了分析理論框架外，也提及了可以如何透過計量方法進行實證研究，釐清個人的合作效用及社會沉默代價對社會網絡連結的影響。。在這個賽局中，不論一個人對於勞工運動的邊際效用是多少，或是他具有什麼樣的階級特性，工會都會試圖與他們溝通並邀請他們加入；至於加入與否則取決於被邀請者本身的效用。雖然這個不效率的賽局並不保證大聯合必然形成，但賦予了一個社會每個角色都具有自主性參與公共運動的權利。

4 1928 以後：工運能動性的衰退

1930 年代，日治時期下的臺灣面臨殖民經濟政策改變，部分產業的資方或調降工資或資遣員工，而相關罷工事件多爲要求勞動權益。1930 年苓雅寮肥料袋工廠爲因應日資肥料公司將承購價格由每單位 12 錢 5 厘調降至每單位 10 錢，高雄六家肥料廠共同宣布肥料袋女織工每單位生產工資下降約 10%。女工認爲雖收購價格下降，但原料價格也下降，因此認定薪資調降不合理，故六家肥料廠共 207 名女工中有 185 名發起了罷工，訴求爲反對降低工資及要求即時清還所欠工資。面對罷工，資方的態度明確拒絕任何條件，且逐漸聘入新女工。面對失業的風險，在一個月後有 116 名女工復職，故罷工以失敗告終 (臺灣新民報)[22]。

1931 年臺灣出版工會籌備會爲限縮生產，限制每月工作天數爲 22 天，因其以日計酬，故可以變相減少勞動成本。勞工與資方談判恢復工時未果，故發起罷工，並佔領工廠。一開始勞工的訴求爲「一、收回縮短工作時日的成命；二、採用八小時工作制；三、要求休業中支付薪資」，但在警方逮捕了六名幹部及部分參與者，且資方全數回絕全部條件後，勞方妥協條件爲「一、現階段開除者復職之事；二、不得解雇被北署留置的罷工工人；三、會社方面虛僞問府扣遭北署留置的罷工工人的家屬」。在妥協條件後，除六名幹部外，被北署留

[21]在網絡賽局中，外部性 (externality) 專指決策者面對社會空間對談判均衡潛藏的影響，與一般經濟學脈絡下的外部性有些微差異。

[22]《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四十六期、《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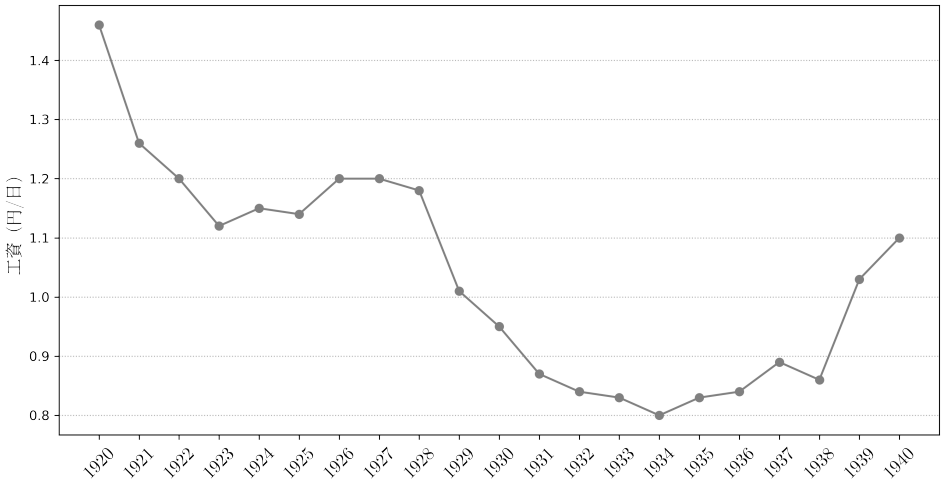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勞工實質工資率變化 (1920-1940)。資料來源：溝口敏行 (2008)

置的工人也都復職。然而，由於六名幹部仍未復職，工人發起了再罷工；而資方直接解僱所有罷工工人並表示對有意復職的勞工採取再聘用的方式，而其餘則另外聘用新員工 (翁佳音, 1992)，此次罷工也以失敗告終。以上僅是 1930 年初期針對勞動權益下降發起罷工的兩個案例，實際上在蔣闊宇 (2020) 所整理的 1930 年代罷工事件，相關案例不佔少數，但大多都以失敗作結。

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資方面對低工資率的時候，可能是面對生產力下降、市場萎縮、或政府政策干預蔣闊宇。[23]提出 1926 年到 1928 後的勞工運動動能變化是受到農工生產及實質工資流向的影響。但實際上分析溝口敏行 (2008) 的資料，工業生產毛額與工業勞動市場都不斷在擴大，僅有實質工資率下降。因此如林文凱 (2018) 所提出的批判，單純以生產力下降或市場萎縮作爲經濟不景氣的論述未必符合經濟現實，更適洽的分析應從 1929 年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外生衝擊開始，討論在那之後的經濟循環及勞動需求變化[24]。我們根據林文凱的經濟論述，即當時的勞動需求改變是受到 1929 年金融危機的外生衝擊後的循環變動進行推論。從勞動窖藏模型 (labor hording model) 的觀點分析，由於資遣員工需面對不同形式的成本，因此廠商面對外生衝擊時廠商的勞動需求變動會較總外生衝擊小，且會影響到未來的勞動最適選擇 (Burnside et al., 1993)[25]。在勞動窖藏模型下，1929 年對勞動需求的衝擊會在未來的幾年持續，並有可能在維持勞動雇用人數的前提下降低實質工資 (Kim and Lee, 2007)。如圖1所示，在 1927-1928 年勞工工資較爲穩定之後，1929 年至 1936 年代的勞工實質工資都委靡不振。回到罷工者所面對的社會經濟條件，在 1929 年到 1936 年間，當面對勞工發起罷工時，因廠商沒有誘因提高勞動福利且原本的解僱成本被轉嫁到罷工成本上，廠商便會選擇解僱員工。就勞動供給面來說，由於廠商的勞動需求已被「窖藏」的員工滿足了，因此新投入就業市場的勞工難以找到工作；但當廠商解僱舊員工時，

[23]《臺灣總罷工》頁 318-324

[24]更詳細的分析涉及總體經濟及殖民經濟政策層面的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本文僅以 1929 年金融危機的外生衝擊爲基礎進行討論，但即便有其他經濟學因素的影響，我們仍應可以得到相似的結論。

[25]參考國立臺灣大學毛慶生教授於 2023 年春「總體經濟學下」的授課內容。

市場仍有潛在的勞動供給，因此相對容易找到替代勞動力。從以上總體分析，我們可以推測 1929-1936 年間，勞工對罷工的預期回報低且因替代人力因而失業風險高。

除了總體經濟的分析，我們亦須考慮到政治運動組織因 1931 年蔣渭水去世，左右翼政治組織的運動路線分裂對工運組織的衝擊。但從上章所提到的個體角度分析，在罷工的預期回報低時，不論是發起工運的個人、組織又或是被邀請加入罷工的勞工對於聯盟的預期效用都會下降，同時在建立連結的意願降低時社會冷漠的外部性又會降低預期效用。在兩個因素的惡性循環下，不僅是大衆在加入罷工時需要付出的風險過高因此沒有動機，聯盟內部願意付出的溝通成本也相對降低。雖然社會冷漠的成本仍舊存在，但因爲罷工所帶來的最大效益有限，因此理性決策者所評估的外部性會下降。在這個社群網絡中，個體並沒有動機形成工運網絡，進而導致工運網絡的再離散化。換句話說，社會學過去提出政治運動路線對工運再離散化的假說確實存在，但經濟循環的影像也不可忽視。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能直接透過圖1說明實質工資率與罷工活動的因果關係，但就相關性而言在 1927-1928 年罷工運動蓬勃發展完，1929 年後的罷工能動性便逐漸下降。然而，即使社會經濟條件不利於勞工運動的發展，勞工運動的平權意涵仍在。高雄鐵工所罷工的部分幹部在 1928 年成立了「高雄工友鐵工所」，章程爲「失業而欲在本工廠工作者均可投資，但爲投資而工作者，或投資而爲工作者，不得置喙工作經營之事」(翁佳音, 1992)，並實施八小時工作制、提供工人低於市價的日用品，並營業包含機械製作、農家用具、家庭器具等相關工業事項，實踐了勞動平權的企業[26]。另外，本段最初提及 1930 年的苓雅肥料廠女工罷工事件，在罷工之後，部分女工與其家庭出資成立了自己的肥料袋公司，亦聲明失業女工、受業主虐待之勞工、及生活困難之罷工者優先錄用[27]。由這兩個案例，我們可觀察到勞工運動的機會平等主義意涵仍被保留且與單純的罷工風險與溝通成本未必相關。由前段的個體理論分析，我們推論此時工運的平等主義以利他性偏好的方式被顯現。

5 臺灣工運史的平等主義反思

日治時期臺灣的工運由 1920 年代最早的勞動權益啓蒙，至 1927 年蓬勃發展時的集體意識，都展現了民族主義論述外的自主性。雖然勞工運動與民族自決運動都從面對共同的壓迫經驗形成集體行動甚至是不同運動動能的共謀，但在歷史學的系譜中兩者應有其各自的發展途徑。重疏史料後，我們主張不論將工運視爲中華民族主義或是將其視爲最早臺灣獨立運動的附庸，都不足以完整地詮釋勞工運動在日治時期臺灣的自主發展軌跡。基於本研究的社會經濟學分析，我們嘗試透過理性決策者的角度形塑工運形成的個體動機，並強調機會平等主義的實踐除了從利他性偏好推論外，也可能由社會整體氛圍對勞動權益爭取的影響進行討論。藉由社會網絡分析，我們將個體經濟理論的賽局框架聯繫到集體行動的結果預測，並與總體經濟循環做出了連結。這份研究除了從臺灣本土研究的視角再論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在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也回應了經濟學家時常在效益主義與平等主義陷入的二元選擇困境 (Myerson, 1981)。

[26]《臺灣民報》第一百八十九號
[27]《臺灣民報》第三百五十二號

近日於臺灣出版的《資本與意識形態》(Piketty, 2020) 除了探究不平等的經濟學起源外，更由全球歷史經驗的交互比較強調現代不平等與意識形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本文不斷強調的機會平等主義在集體行動中的內涵，事實上，即便是經濟理性的社會行動者也可以在提升個人效益的條件下追求合作且公平分配的社會。我們除了重新描述殖民統治下臺灣勞工的運動自主性，也試圖以此爲社會經濟學理論基礎討論參與式民主的理想。本文在歷史文獻的回顧中，顯示了日治時期臺灣的工運相關報導可以作爲豐富的經濟學分析資料基礎。透過回顧這些文獻資料，我們注意到《臺灣民報》除了提供工運發展的歷史事件外，也詳述了不同社會運動參與者如何互動進而形塑具有平等主義內涵的共識，及他們在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藉由參與社運及工會組織實踐其精神。這些敘述不僅提供當時工運參與者更立體的形象，也能提供經濟學家建構社會網絡分析所需的資訊。隨著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技術的提升，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這些史料，釐清過去經濟個體的行爲及其集體行動對社會的影響 (Dell et al., 2018; Dell and Olken, 2020)。在克服資料不足的挑戰後，我們便能夠透過計量模型提供量化的分析，將利他性偏好、對社會氛圍的效益評估作爲參數與其他經濟要素的外生衝擊進行分析[28]。

我們期待透過此研究能夠由臺灣本土視角分析當代的經濟意識形態如何形塑不平等，並由歷史學及經濟學的證據論述我們可以如何透過個人決策實踐參與式民主與平等主義的內涵。

[28]本文作者的研究計畫 *On the Egalitarianism in Coalition Formation within Social Networks* (Chen, 2023 *Proposal*) 除了以形式化的語言描述相關賽局理論，也提及他如何計畫利用 NLP 所建構的社會網絡資料進行計量經濟學研究。

Reference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hn S. Ahlquist. Labor unio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09–432, 2017. doi: 10.1146/annurev-polisci-060415-093106.

Franco Barchiesi. Labor and social citizenship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modernity: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s in a continental context.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30(1):17–43, 2007. URL https://www.jstor.org/stable/40241676.

Yann Bramoulle, Habiba Djebbari, and Bernard Fortin. Identification of peer effect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0(1):41–55, 2009. doi: 10.1016/j.jeconom.2008.12.021.

Stephen G. Bronars and Donald R. Deere. The threat of unionization, the use of debt,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shareholder weal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1):231–254, 1991. doi: 10.2307/2937914.

Craig Burnside, Martin Eichenbaum, and Sergio Rebelo. Labor hoard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245–273, 1993.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138819.

Geoffroy De Clippel and Roberto Serrano.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nd externalities in the value. *Econometrica*, 76(6):1413–1436, 2008. doi: https://doi.org/10.3982/ECTA7224.

Melissa Dell and Benjamin Olken. 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in jav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1): 164–203, 2020.

Melissa Dell, Nathan Lane, and Pablo Querubin. 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Econometrica*, 86(6):2083–2121, 2018.

Jack Fiorito. Unionism and altruism. *Labor Studies Journal*, 17(3):53–70, 1992.

Patrick Flavin. Labor union strength and the equalit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1075–1091, 2018. doi: 10.1017/S0007123416000302.

A. Gordon. Workers movements in late meiji tokyo. *Bulletin de l'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84:285–308, 1997.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3731461.

Chih-Sheng Hsieh, Lachlan Deer, and Fernando Vega-Redondo. Riot networks and the tullock paradox: An application to the egyptian arab spring. (18093), 2023.

Matthew O. Jackson. A survey of models of network formation: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0303011), 2003.

Harry C Katz.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lr Review*, 47(1):3–22, 1993.

D. Kim and C. I. Lee. On-the-job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Implications for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lasticity and labor hoarding.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0(3):494–518, 2007.

Ephraim P Makambe. The exploitation and abuse of african labour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of zimbabwe, 1903-1930: A lopsided struggle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23:81–104, 1994. URL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520271.

Michio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UP Archive, 1973.

R.B. Myerson. Conference structures and fair allocation rules. *Int J Game Theory*, 9: 169–182, 1980. doi: 10.1007/BF01781371.

Roger B Myerson. Utilitarianism, egalitarianism, and the timing effect in social choice problem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pages 883–897, 1981.

Roger B. Myerson.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URL https://doi.org/10.2307/j.ctvjsf52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José María Ramos Parreño and Fernando Sánchez-Losada. The role of union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4(2):171–192, 2002. doi: 10.1016/S0164-0704(02)00023-X. URL https://doi.org/10.1016/S0164-0704(02)00023-X.

Sanford A. Rubinstein. Unions as value-adding networks: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of u.s. unionism.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2(4):581–598, 2001. doi: 10.1007/s12122-001-1022-y.

Tina A. G. Venema, Floor M. Kroese, Jeroen S. Benjamins, and Denise T. D. de Ridder. When in doubt, follow the crowd? responsiveness to social proof nudges in the absence of clear preferenc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1385, 2020. doi: 10.3389/fpsyg.2020.01385. URL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1385.

S. Wolcott. Strikes in colonial india, 1921-1938.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1(4):460–484, 2008.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5249168.

何明修. 沒有階級認同的勞工運動：台灣的自主工會與兄弟義氣的極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2:49–91, 2008. doi: 10.29816/TARQSS.200812.0002.

何明修. 勞工運動的歷史制度論觀點：回應呂建德教授的評論. *台灣社會學*, 29:191–198, 06 2015. doi: 10.6676/TS.2015.29.191.

公論報. 先烈蔣渭水逝世廿週年特刊. *公論報*, 8 1950. 各地通訊本報訊.

林文凱. 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 *臺灣學通訊*, (105), 5 月 2018.

溝口敏行. *Asi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Volume 1: Taiwan*. Toyo Keizai Shinposha, Inc., 2008.

王育德. *台灣－苦悶的歷史*. 草根, 4 1999. ISBN 9789578018570.

翁佳音. *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 稻鄉, 1992. ISBN 9579405522.

臺灣新民報. 臺灣文獻資料庫. URL https://www.dhcdb.com.tw/TM/.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文獻資料庫. URL https://www.dhcdb.com.tw/TM/.

臺灣民報. 臺灣文獻資料庫. URL https://www.dhcdb.com.tw/TM/.

蔣闊宇.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 前衛, 05 2020. ISBN 9789578019133.

連溫卿. *臺灣政治運動史*. 稻香, 臺北, 1998. ISBN 9867862325.